



西方视野下的中国文学经典研究： 以宇文所安为例

殷晓燕 著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四川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国文学经典研究的西方视野转换”资助项目

西方视野下的中国文学经典研究： 以宇文所安为例

*Xifang Shiye xia de
Zhongguo Wenxue Jingdian Yanjiu:
Yi Yuwen Suo'an Weili*

殷晓燕 著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 晶
责任校对:夏 宇
封面设计:米迦设计工作室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视野下的中国文学经典研究:以宇文所安为例 /
殷晓燕著.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4. 8
(文化视阈)

ISBN 978-7-5614-7976-6

I. ①西… II. ①殷…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95693 号

书名 西方视野下的中国文学经典研究:
以宇文所安为例

著	者	殷晓燕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7976-6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	张	10.5
字	数	272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http://www.scup.cn>



作者简介

殷晓燕，山东青岛人，文学博士，副教授，现就职于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05年就读于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文系，攻读文艺学专业，2008年获得博士学位。同年，进入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0年起任中文系主任。已独立完成校级课题一项、四川省教育厅重点项目一项；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一项，参与文化部项目一项。近年来在《江西社会科学》《社会科学辑刊》《中南大学学报》《文艺评论》等CSSCI期刊与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十多篇，参与编写教材《国学经典导论》一部，并获得四川省第七届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成都市第十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等奖项。

“他山之石”究竟是怎样的“石”

阎 嘉

记得当年在哈佛大学之时，有美国教授不无自豪地对我说，不要以为只有中国人才配研究中国文学。从他那自豪的口吻中，愚钝的我凭直觉感到，其言下大有深意。直到听了宇文所安教授讲授唐代诗歌的课以后，我才真正领悟到美国教授研究中国文学的独特之处：他们非常注重对文学文本的“细读”，在此之上，他们凭借自己的学术背景和价值立场，对文本的深层意义加以解读。这两招，多半是我们所不大关注的。今天的文学研究者，往往缺乏严格的文本解读的训练，喜欢凭印象进行天马行空式的分析论述，堆砌时髦的辞藻和现成的说法，以为可以赶上风气的节奏，其结果多半与研究对象不搭界。再说，学术背景和价值立场，大多与学术训练和独特的经历、处境有关，那就是说，多半都有成熟的学术思想作为依托。因而，在我看来，文学研究最基本的资质，就是细致的文本解读功夫和明确的、有理据的价值立场。

我现在常说，眼下中国学术研究最没有“门槛”的领域，就是中国文学研究。大凡能认识汉字、会说汉语的人，只要想在学术圈内立足，首选的研究领域就是中国文学。殊不知，天下所有的研究领域，都有自身的“门槛”。就拿中国文学研究来说，中国传统里有文史哲不分家之说，这就需要广博的历史、哲学、典章制度，乃至天文、地理、语言文字等方面的修



养。而洋人的“他山之石”，不同于我们的是精细的文本解读功夫和坚定的学术价值立场。还有，现今的文学研究者，由于诸种因素的影响，常常缺乏高超的文学鉴赏力，遑论研究中的真知灼见，这也是我们不敢恭维诸多研究“成果”的一个重要原因。

鉴于今日中国学术研究的现状，转换眼光，认真看看洋人们在做些什么和怎么做，对我们的确是具有启发意义的。殷晓燕博士所做研究工作的意义，正在于此：对西方人的中国文学研究进行研究，探究“他山之石”到底有何等特异之处，以此作为借鉴。正如本书《绪论》所说：“汉学家们的研究也为中国文学经典的研究开启了另一扇窗户，通过他们的研究视野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学经典在西方的‘另类’研究。这些研究或许会让我们感觉诧异，或许会带给我们惊喜，但无论如何，这都是经典存在的意义与汉学家的使命。”本书分别从方法论（分期法、互文性、点面辐射、跨时空叙述），文学经典形成论（政治权力与文学的关系、反叛传统与地域空间的对立、审美趣味的转变与挖掘人、文人经典化的意识），文学经典的女性作者（女性作者的身份与作品价值、女性作者书写与性别声音、探索内心隐秘），经典作家剖析（陶渊明的双重自我、李商隐的隐喻多义、杜甫的虚幻想象）几个方面入手，具体而细微地分析论述了宇文所安教授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招数”和“他山之石”的特异之处。但从以上罗列的问题来看，足见洋人研究的着眼点与我们的相异之处。本书作者清晰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宇文所安的研究带给我们一种新奇感。见惯了国内学者在儒、释、道背景下的文化阐释，宇文所安不拘于此套路的手法反而令我们感到新鲜。他喜欢从作品入手探索诗人的隐秘，突显作者与现实的张力，运用反讽的手法揭露诗人的表象。如他对陶渊明、李清照、杜甫、李商隐等人人性的挖掘，动摇了我们对他们固定的印象。宇文所安的见解恰恰为我们打

开了一扇门，让我们能够站在门外反省我们的文化与文学。”

是的，我们的文化和文学确实需要反省。不过，我以为，作为文学研究者，在反思中国文化和文学时，最为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在西方近代以来“审美”意义上的“小文学”的概念，全然不同于中国传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文学”的概念。若不在理论上对此加以厘清，以今日之“美文学”的陈规老套，去硬行框定上通天地宇宙之道、下达社会人生之道的“泛文学”，恰如堂吉诃德把风车当作巨人、把羊群当作军队，闹出驴唇不对马嘴的笑话来。这可能是我们这么多年来在理论上最大的误区之一。即便在宇文所安教授的眼中，大概很少会认为文学是娱情悦性、自由解放、精神超越、高悬于天国之上的“美学圣女”。文学作为人生体验的表达方式之一，必定与人生相关的种种方面相互牵连，审美也必定与人生的重大关切相关。

所以，如果说宇文所安教授的中国文学经典研究对处于文化断层境况中的我们有什么最重要的借鉴意义的话，那么，就是把严格的学术训练运用于文本细读，并不先入为主地拿着审美的文学或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标签去随意张贴，把文学研究变成标签仓库和标签制造工厂。当然，同样重要的是，既要关注和研究“他山之石”的长处和独特性，更要认真审视本土之“玉”的本来面目，莫让标签的浮云遮蔽了我们的双眼。

以上是我在读殷晓燕博士的近著《西方视野下的中国文学经典研究：以宇文所安为例》时随心所至想到的。我的联想和说法都不要紧，只要读者们真正理解了本书为我们呈现的宇文所安“另类的”中国文学研究，那么，总会激起某些思想的花来。若真的如此，那就是本书的价值之所在。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他者的眼光：方法论	(32)
第一节 历史分期法	(32)
第二节 “互文性”的运用	(53)
第三节 点与面辐射法	(76)
第四节 跨时空叙述法	(94)
第二章 文学经典形成论	(114)
第一节 政治权力与主流文学风尚的推动	(115)
第二节 对传统的反叛与地域空间的对立	(131)
第三节 审美趣味的转变与“挖掘人”的出现	(160)
第四节 文人经典化的自我意识与文集的保存	(176)
第三章 文学经典女性作者论	(189)
第一节 女性作者身份与作品价值论	(190)
第二节 女性书写与“性别声音”特征	(205)
第三节 从内心隐秘探索李清照	(224)
第四章 经典作家剖析论	(248)
第一节 双重自我的陶渊明	(249)
第二节 隐喻多义的李商隐	(262)
第三节 幽默随便的智者杜甫	(289)



文化视窗

结 语	(303)
参考文献	(311)
附录 宇文所安主要著作一览表	(322)
后 记	(325)

绪 论

20 世纪是信息交流的世纪，20 世纪也是不同文化区域的人们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的世纪。过去的二三十年是层出不穷的西方文论在中国掀起一波又一波高潮的时代，也是中国文学与文论迅速发展的时代。中国文论的发展又与西方理论的频繁更新有关，当国内学界以一种猎奇的心态深入对西方文论的研读时，蓦然回首，却发现在西方的主流文坛上缺少了中国自己的声音。因此，国内学界开始反省与忧虑此现象的产生是否会导致中国文学失去自己的“声音”，造成“失语症”，并形成一种“文化病态”^①。

然而，令人可喜的是，西方却活跃着一批汉学家，长期以来孜孜不倦地关注中国传统文学，并持之以恒地从事研究，不断研读其中的经典文学作品，以与中国迥异的文化背景、学术修养、视野观点等，为中国传统文学经典在西方的阐释与传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而西方汉学家生长的文化环境、所接受的教育背景、所使用的方法，都与中国学者迥异，对他们学术成果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学经典，并能通过成果的相互对比，发现我们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固定观点存在的认知缺陷。

^① 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载《文艺争鸣》1996 年第 2 期。



同时，汉学家们的研究也为中国文学经典的研究开启了另一扇窗户，通过他们的研究视野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学经典在西方的“另类”研究。这些研究或许会让我们感觉诧异，或许会带给我们惊喜，但无论如何，这都是经典存在的意义与汉学家的使命。正如汉学家们自己所言：“它们等待千年只为有人读或误读。它们有耐心并将逗留下一个千年。对于我们可能为寻求事实所施展的最狂野的想象，它们丝毫不受影响。……有些建构可能会令你反感，有些可能会引起你的兴趣，有些甚至似乎能回答诗歌在等待中所要求的。我们把它们展开、擦亮，抖掉它们身上长久的沉寂。”^① 简言之，正是由于有这样一批汉学家的存在，他们在异于中国学术的文化背景下去进行研究与解读，无论他们看到了什么样的风景，从什么角度去看，都会为我们带来启发，因为即使对待同一座山，也会出现“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视野区别，更遑论“我们应以不同的方式而不是以习惯的方式阅读。伟大的艺术不为确证一个我们感到舒适如归的世界而存在，相反，它要求我们将自身交给另一个世界一次”^②。这其中，美国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宇文所安，就是从事中国传统文学研究中的一位佼佼者。对他的成果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文学经典经过西方视野的转换研究后形成了哪些新的认识，对我们有什么启示。

一、基本情况简介

宇文所安，本名斯蒂芬·欧文（Stephen Owen），美国哈佛

① [美] 宇文所安：《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世界的征象》，陈小亮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页。

② 同上。

大学东亚系主任，同时也是比较文学系主任，中国古典诗歌与文论研究领域首屈一指的汉学家。

宇文所安，1946 年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长于美国南方的阿肯色州。1959 年移居巴尔的摩。在巴尔的摩公立图书馆里，14 岁的宇文所安沉湎于诗歌阅读，并初次接触到中国诗歌，虽然只是中文翻译，但他迅速对中国诗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报考大学时，他毫不犹豫地填报了耶鲁大学的中国语言与文学专业，并于 1968 年获得学士学位。随后他继续在此专业深造，1972 年以论文《韩愈和孟郊的诗歌》（*The Poetry of Meng Chiao and Han Yu*）获得耶鲁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学专业的博士学位，毕业后执教于耶鲁大学，直到 1982 年进入哈佛大学任教，并在 1997 年晋升哈佛大学詹姆斯·布莱恩特·柯南德特级教授，成为欧美学界研究中国文学的大师级人物。

宇文所安此生待过两个最重要的地方，那就是耶鲁大学与哈佛大学。正是这两所世界级顶尖学府给他提供了优良的学习与工作环境。良好的学术氛围帮助宇文所安养成深厚的学养，形成先进的治学理念以及与时俱进的研究方法。

从他年少时对中国诗歌产生兴趣到上大学时选择中国语言与文学作为自己的专业，他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可见一斑。他的父亲是一名物理学家，曾因他选择中国文学研究而颇为其生计担忧，没想到他最后竟能在此领域做出如此成就而甚感欣慰。宇文所安著述甚丰。宇文所安 1972 年以其论文《韩愈和孟郊的诗歌》获得博士学位，并于 1975 年出版此书；1977 年则出版了《初唐诗》（*The Poetry of the Early Tang*）一书；1980 年出版《盛唐诗》（*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 The High Tang*）；1985 年出版《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世界的征象》（*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 Omen of the World*）；1986 年出版《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



(*Remembrances: The Experience of the Past i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1989 年《迷楼：诗与欲望的迷宫》(*Mi-Lou: Poetry and the Labyrinth of Desire*); 1992 年《中国文学思想读本》(中译本名为《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1996 年《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The End of the Chinese “Middle Ages” - Essays in Mid-Tang Literary Culture*), 同年, 完成《诺顿中国文学选集：初始至 1911 年》(*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Beginnings to 1911*) 的编选与翻译工作, 其中的大部分章节都是他亲自翻译的。此书涉及年限较长, 一千两百多页, 是一项量度非常巨大的工作, 由此也列入美国权威公司诺顿的出版计划内, 为中国诗歌在国际上的影响起到了很好的平台作用; 2003 年, 出版由田晓菲翻译的《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 2006 年出版《晚唐——九世纪中叶的中国诗歌》(*The Late Tang: Chinese Poetry of the Mid-ninth Century, 827-860*) 和《中国早期古典诗歌》(*The Making of Early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2010 年, 由他和耶鲁大学的华裔汉学家孙康宜(Kang-I Sun Chang)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一书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2013 年中译本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 此书的编写也为中国文学史的重写带来全然不同的一面。

兴趣是人生最好的老师, 正是对中国古典文学浓厚的兴趣才使宇文所安在此领域做出了骄人的成绩。同样, 他的成功也得益于其所在的优良环境。他所在的两所大学都是美国汉学研究的重要场所。美国汉学研究源于 1840 年后的新教入华传教, 1876 年, 耶鲁大学开设了汉语课, 并在新教教士卫兰畏的主持下建立了美国第一个汉语考古室和东方图书馆。第二年, 哈佛大学也开设了汉语课, 并设立了东方图书馆。进入 20 世纪,

燕京大学又成立了燕京学社，为美国的汉学研究创造了条件。而给予宇文所安启蒙并助他走上学术之路的母校耶鲁大学也是20世纪中期美国英语文学研究重要的地方，此校既是美国新批评派重镇，也是解构批评的要塞，诸如韦勒克、哈罗德·布鲁姆、杰弗里·哈特曼、保尔·德·曼、希利斯·米勒等都曾在那里任教，而后面四位即是有名的“耶鲁四子”。这些英语文学研究的大师，无论是新批评还是解构批评，都非常重视对文本的细读，而这些又不能不影响宇文所安：“他对中国诗歌特殊的敏感和解析能力，渗透着文本细读精神，并且他本人对西方诗歌的传统也是非常熟悉的，阅读非常广泛。”^①故宇文所安在研读中国诗歌时，能够从文本出发，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历史背景与传统文化，结合自己迥异于中国学者的西方文化背景与哲学背景，从浩如烟海的中国诗歌中，筛选出他眼中的经典之作，用一种独到的眼光，把中国人习以为常或熟记于胸的诗歌以一种崭新的视角解读出来，令人耳目一新。

长期以来，中国学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无论是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传统的注、疏、校、证、笺、训、诂等方法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待同一文本获得了不同的成果。但在相同的语境中，这些固定的模式有可能成为束缚，在对一些经典性诗歌与文学现象的解读上，我们已经形成了恒定不变的印象，很难打破已有的定论。这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是人们对熟知的东西记忆更深刻，缺点则是难以有所突破。要在我们的古代文学与文论研究中取得新成果，则必须有新的因素注入其中，西方汉学家不同的文化语境与知识背景恰好可以和我们形成互补。因此，吸收和利用来自不同视野的海

① 复旦大学陈引驰教授在给笔者的回信中如是说，谨表感谢。



外汉学家的研究成果，无疑可以弥补我们自身的缺陷。正如田晓菲以一个海外汉学家的身份所说：

中国文学有一个很长的诠释传统，这一诠释传统有其优点，但有时也不免变成负担，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我想我们应该以广泛阅读和细读文本为基础，重新检视传统结论，检视任何“常识”性的知识，进一步打开研究视野，多了解国际汉学同行的最新研究成果，也多增加一些对世界文学的了解，多增加一些对理论的了解。无论中外，研究一国文学的人往往对其他文学不闻不问，形成一个密闭的小圈子，我倒觉得文学研究者都应有点广泛的文学阅读经验。^①

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当一种体系太过完备时，就有可能趋于封闭，“封闭就是老化的开始”。故乐黛云先生说：“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途径就是沟通，即找到一个参照标准，在与参照标准的比照中，用一种‘非我的’、‘陌生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自己，这样，才有可能跳出原有体系的‘自我设限’，扩大自我，以承受和容纳新体系：这种开放、融合就是对原有体系的批判，也就是对原有体系的重建和新体系的诞生。”^② 乐黛云先生正是在多年的研究与教学工作中，才有如此深切的体会。她在用宇文所安的书教授学生时，也确实让学生从中受益良多。只要人类存在于同一宇宙中，在越来越发达的资讯传递技术中、互通有无的信息交流过程，才会让文化获得双赢的结果。王晓路先生也提出：“人类社会有史以来，不同

① 田晓菲：《中国人研究汉学未必有先天优势》，王寅整理，载《南方周末》2006年8月31日。

② 乐黛云：《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序言》，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页。

文化间的广泛交流从未像今天这样频繁和便捷。在这一新的历史语境下，我们在观察他者的同时也从新角度反观到了自身，文化互识、文化资源、文化认同与问题意识的重要性由此更为凸显。”^①

从以上专家学者的话语中可以看出，学习并借鉴“外来和尚”的“经”，可以为我们的文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其实，在这一点上，不仅老一辈专家实践并取得了丰硕成果，而且在新的历史时期，已成为一条持之有效的经验。乐黛云先生说：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长期以来大多在一个封闭的体系中进行，直到 20 世纪，王国维、宗白华、朱光潜、闻一多等前辈学者从西方找到新的语境，扩大了视野，重新观察中国文学的丰富遗产，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开创了崭新的局面。……随着一代新汉学家的崛起，在西方文学理论迅速更迭的语境中，西方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取得了相当突出的成就，这些成就形成了一个新参照系，在很多方面足以启发我们对中国古典文学进行新的思考。^②

当乐先生在说这些话时，她面对的是 20 世纪末的情况。10 年后的今天，我们面对的是更为开放的、与世界接轨的中国。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面对的不光是经济的全球化，同时也包括思想与文化上的国际化，因此更不能故步自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全球化的文化视野，闭目塞听，固守本土视野，就会‘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而西方文化历来具有与中国不同的异质性，生长在那片土地上的汉学家，他们在研究中国文学时所采用的视角与手法，也会

① 王晓路：《西方汉学界的中国文论研究》，巴蜀书社，2003 年，第 32 页。

② 乐黛云：《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序》，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1-2 页。



打破我们惯常的思维模式，也许有时会让我们有受阻的感觉，但这又确实是吸收“他者”精华的必经之痛。

当然，海外汉学家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是非常多样化的，他们有时候采取的治学方法和研究角度，和我们的传统学术研究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有时则存在着很大的不同。至于和国内研究差异较大的方面，还体现在研究视野的不同和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上。宇文所安说，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文学著作时，“最有价值的方面常常是它所体现的思维习惯：提出了什么问题，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这种‘思维习惯’部分地带有个人的色彩，但也都反映着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①。正是这种天然的地理优势，才使西方学者能够站在不同的据点上来审视和研究中国文学。宇文所安说：“在一个更大的规模上，所有的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学的研究都是用的这种方式。我们的环境，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我们必须与之交谈的学生和同事，自然形成了我们探讨中国文学的一种方式。当这种方式处于最佳状态时，它能为中国文学提供新颖的观点，既不离奇，也不牵强。”^②虽言辞有过誉之嫌，但还是一语中的，将海外汉学的特殊价值显现了出来，这也正是他们呈现出来的使中国同行感兴趣的東西。对此，莫砺锋先生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第一，由于西方学者处于与中国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中，当他们研读中国古典诗歌时，就可以避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缺陷。比如说，我们读古诗时，对许多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细节从不深究。而西方学

① [美] 宇文所安：《神女之探寻——英美学者论中国古典诗歌·序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页。

② 同上，第3-4页。